

## “言志”批评探源

高文强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言志”批评其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志”的含义以及承载“言志”功能的主要文本“诗”的含义都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志”的最初含义主要指“知”与“智”及其记录,“诗”则是这种记录的文本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言志”由重“言知”和“言智”逐渐向重“言志(怀抱情志)”演化,“诗”也由一般的记录文本向特定的韵文体裁演化。春秋时期,随着《诗》类编的不断完善固化,以及以《诗》教化传统的不断深化,“诗言志”(以诗言怀抱情志)这一诗论开山纲领才得以确立,并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诗; 志; 言志

**[中图分类号]** I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0)05-0032-06

说到“言志”批评,人们自然会想到著名的“诗言志”说,以及朱自清先生赋予其的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这一评价。而关于“诗言志”的研究成果,百年来从《诗言志辨》(朱自清)到《诗言志再辨》(饶宗颐)到《诗言志续辨》(高华平)等等可谓多矣。不过,或许是受“诗言志”说的名气和朱先生的评价的影响,对“言志”批评的探讨,有些问题囿于“诗”的范围而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如“言志”的丰富内涵包括哪些?这些内涵是如何演变发展的?远古之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言志”?为什么“诗”可以“言志”?先秦“言志”批评的意义在哪里?等等。本文拟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若干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 一、所言何“志”

讨论“言志”批评之前,我们先要厘清所言之“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如此才能清楚所谓“言志”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关于“志”的含义的讨论,即使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文章依然不断,然而对“志”的含义的讨论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闻一多先生写于1928年的《歌与诗》一文以及朱自清先生出版于1947年的《诗言志辨》一书。因此,二人所论虽已被反复引用,但在此依然有必要赘引一二。闻一多先生在翔实材料引证基础上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sup>[1]8</sup>其实这三个意义中,“记忆”和“怀抱”都可归于内在意识层面,大概都属于“意”的范围;而“记录”则是“意”的外在言语呈现,可以说属于“言”的范围。因此可以说,“志”的最初内涵包括了“意”和“言”两个层面的内容。不过,当“志”和“诗”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更重视的是其“意”这个层面的内涵。朱自清先生便认为:“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sup>[2]2</sup>“这种志,这种怀抱,其实是与政教分不开的。”<sup>[2]3</sup>也就是说,在“诗言志”这个语境中,“志”的含义范围已缩小为“意”层面的“怀抱”了。《说文》中对“志”的解释似乎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志,意也。”“意,志也。察言而知意也。”<sup>[3]695</sup>指出“志”就是“意”且需察言而知,而其“言”这一层面的意义则已消失不见。其实这一观点在春秋“赋诗言志”活动中也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来证明,或许这也正是朱先生确定到了“诗以言志”(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时“志”就指“怀抱”的主要原因,而对记载“诗言志”的《尧典》他也接受顾颉刚先生的观点认为“最早也是战国时才有的书”<sup>[2]2</sup>,其“志”指“怀抱”就更不是问题了。之后论“志”者,基本没有跳出朱自清先生框

**[收稿日期]** 2020-08-06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

**[作者简介]** 高文强(1969—),男,湖北孝感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

定的范围,细微的差别也只在“怀抱”或“意”的内涵的不同理解罢了。例如,有学者认为“诗中之‘志’自当取‘怀抱’之义乃为妥帖。这并不排斥诗可用来记事,但主要职能在于抒述怀抱”<sup>[4]</sup>;也有学者认为“‘志’包括诗人的心、性、情、意等许多方面的内容”<sup>[5]</sup>。

从上述学者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志”置于“诗”这一文体之中来阐释“志”的含义。那么,在“诗”这一语境下将“志”的含义解释为“怀抱”是否恰当?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至少这一解释多少有一点以今释古的味道。就是说我们多少受到今天对“诗”这一体裁的界定的影响,使我们对“志”的理解有了一个预设的范围。读《诗言志辨》可以明显感觉到,对“志”的含义的探讨,朱自清先生有意避开了闻一多先生的远古探源,而直接从“诗以言志”时代开始说起,这显然有点“赋诗断章”的意味。“志”的含义演变,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而且引申义之间也往往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许多时候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内涵,很难用一个清晰界线简单划定。对“志”含义的认识,有必要从其源头开始梳理。

关于“志”的最初含义,《说文》是用“意”来释“志”。这一解释虽不能说道出“志”的全部意涵,但也指出了其最初意涵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层面,而且这里的“意”应该比“怀抱”的含义要广泛得多。闻一多先生所释“记忆”或“怀抱”都是“意”之一种。近年饶宗颐先生根据出土文献对“志”在“意”层面的含义又有了一定的补充。这里我们对饶先生的论证过程不再赘述,仅谈其结论。饶先生在《诗言志再辨》一文中指出:“古人极重视‘志’。‘志’为‘心’所主宰,故云‘志,心司’。‘志’可说是一种‘中心思维’,思想上具有核心作用。”<sup>[6]133</sup>这里指出“志”是对事物的一种“思维”。《论语》有“志于道”,《孟子》有“志,气之帅”,指出了“志”对于体道与修身的重要意义,与“思维”义有相通之处。饶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贞之哲学》则对“志”在远古占卜中的作用做了详细讨论,他根据《尚书·大禹谟》中“蔽志”一词判断:“卜者必先蔽志,即事先决断,打定主意,然后进行卜事,故云‘朕志先定’。”“可见定志之事,殷人可能有之,故《盘庚》有‘若射之有志’一语,由《皋陶谟》的言谯志,亦可证‘蔽志’不是无稽之言。占卜要先行断志,是人谋在先,鬼谋在后,两者皆能协从,是谓大同。……志,是作某种决定。”<sup>[7]</sup>所谓“断志”,就是要事先对所占之事做出判断、做出决定,再看与占卜结果是否相合,由此可见“志”在占卜中的重要作用。“志”在此又有对事物进行“判断”的意思。从闻一多、朱自清、饶宗颐诸先生的讨论来看,“志”的早期含义就“意”的层面来说,至少包括了思维、判断、怀抱、记忆等等含义,因此“志”即使如《说文》中释为“意”,其具体内含也是相当丰富的。

“志”的早期含义就“言”的层面来看,闻一多先生认为将“记忆”用文字呈现出来也称为“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sup>[1]9</sup>。如《周礼·小史》云:“掌邦国之志。”郑玄注:“志谓记也。”<sup>[8]699</sup>确实,“志”也由此成为后来非常重要的一种文体类别,如《左传》中曾提及《周志》《仲虺之志》等,《荀子》中有《聘礼志》,《汉书》中有《艺文志》,二十四史中有《三国志》等等。根据上述“志”在“意”层面的丰富含义,闻先生的这一解释其实可以引伸为“将思维、判断、怀抱、记忆等‘意’用言语呈现出来就称为‘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言语”呈现出来会有两种方式:一是口语,一是文字。有文字的年代“志”为文字记录,无文字的远古时代,“志”恐怕只能用口语记录了。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对“志”的最初含义做一个简要概括:“志”主要是指思维、判断、怀抱、记忆等等一类的精神活动,以及对这类精神活动的言语传达记录。

从上述对“志”的含义在具体语境中的分析来看,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关系尤应给予关注:

一是“志”与占卜之关系。《尚书·大禹谟》所言“官占,惟先蔽志”<sup>[9]95</sup>,强调了“断志”在占卜过程中的作用。按饶宗颐先生的说法,所占者其实就是占卜者之“志”,这里的“志”是一种占卜者对所占之事的思维、判断的结果,只是想以占卜来印证罢了。巫史在中国远古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他们应该就是古代中国的第一代知识者。他们的职能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用祭祀仪式沟通神界,用占卜的方法传达神的语言,这叫作‘巫’;一方面他们将人的愿望和人的行为记载下来,映证神的旨意并传之后世,这就叫‘史’”<sup>[10]</sup>。他们是那个时代知识话语权的掌管者,因此他们祈求“神明昭告”之“志”,便是那个时代精英“智慧”的代表,若记录下来,就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精英“智慧”。

二是“志”与仪式之关系。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尧典》中关于“诗言志,歌永言”等的记载表现的“是存在于仪式中的事物关系”<sup>[11]</sup>。远古时期的祭祀或巫术活动常伴有一套仪式活动,其中乐舞是必有的内容,《吕氏春秋·古乐》中所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大概就是这种仪式中的乐舞。在这种仪式中所传达的“志”,显然并非个人之“意”,“即使把‘志’理解为‘怀抱’,对于参与者个体而言,表达的也只是

群体的愿望和要求”<sup>[12]</sup>，“具有切实的群体功利性能的情意指向，正代表着那个阶段人们的普遍的‘怀抱’”<sup>[4]</sup>。这种集体怀抱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集体“智慧”，若记录下来，就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集体“知识”。

因此，远古时期“志”虽然指思维、判断、怀抱、记忆等等一类的精神活动以及对这类精神活动的记录，但值得记录下来的，恐怕大多都是那个时代的集体“知识”和精英“智慧”。《庄子·齐物论》所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国语·楚语》所谓“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大概指的都是这个意思。

从上述对“志”的最初含义做的详细讨论再来看“言志”的内涵，我们就能跳出“诗”“言志”的预设，对“言志”有一个更为客观的理解。那么，“言志”何谓？“言”在此有言说和记录的意思，从上述分析可知，“志”的最初含义恐怕很难与个人情怀联系在一起，因此“言志”自然也非言说或记录的是个人怀抱。所谓“言志”，最初更多指向的是对集体之“知”和精英之“智”的言说和记录。

## 二、“诗”何以“言志”

显然，“言志”并不是“诗”的独家功能。《荀子·乐论》曰：“君子以钟鼓道志。”<sup>[13]</sup>《礼记·礼器》曰：“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sup>[14]</sup>东汉冯衍以赋显志而作《显志赋》。不过，春秋以降，“诗以言志”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至《诗大序》时代，“诗言志”已成为中国诗论的核心纲领。为什么之后“言志”与“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呢？

回答“诗”何以“言志”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厘清到底什么是“诗”。“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含义似乎应该是非常明确的，而且这种明确性似乎可以上推到《诗经》时代，或许正是这种明确性，使得讨论“言志”问题时，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这一问题自然限定在了诗歌体裁的范围。那么《尧典》中所言之“诗”，是不是和后来的文学体裁之“诗”意思完全一样呢？

事实是，“诗”无论作为一个单字，还是作为一种文体，其内涵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说文》曰：“诗，志也。”<sup>[3]</sup><sup>[142]</sup>杨树达先生认为，“志”与“寺”是“古音无二”“音同假借”的关系，而其根据《韵会》所引为《说文》此处补入“志发于言”一句，为“志”的假借字“寺”转变为“诗”找到了依据。<sup>[15]</sup>简言之，杨先生认为，“寺”是“志”的假借字，“诗”则表达的是“志”的言语记录，即“寺”的言语记录，故“言”+“寺”=“诗”。也就是说，“诗”作为“寺”的引伸义字相当于代替了“寺”或“志”的“记录”这一层内涵。出土文献郭店楚简《缁衣》篇引“诗云”，便有不少以“寺”代“诗”的写法。又《语丛一》云：“《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sup>[16]</sup>饶宗颐先生认为：“‘志’与‘事’对言，这和所谓记事、记言同例，《诗》是另一类记‘志’的书。”<sup>[6]</sup><sup>[132]</sup>《管子·山权数》所谓“诗者，所以记物也”<sup>[17]</sup><sup>[1301]</sup>，说得正是这个意思。闻一多先生则进一步指出：“《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sup>[1]</sup><sup>[11]</sup>综合以上论述可知，“诗”最初的含义是指对“志”的言语记录，是“志”的一种文本形式，其所记之“志”，至少包括了早期的集体知识和精英智慧等内容，至于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记录，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过，正因为“诗”所记录的知识和智慧对文化传播与传承非常重要，因此记录所用之“言”自然也有一定讲究。《汉书·艺文志》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sup>[18]</sup><sup>[570]</sup>“诗”之“言”是要诵的。有学者指出：“朗诵最接近日常语言，是最容易被理解的语言。由于这个原因，朗诵在通神仪式中得到广泛应用。从民族学资料看，这种语言包括记诵，即讲述史诗，壮族称‘末论’；包括念诵，即吟读经文，羌族称‘木吉卓’；包括祝诵，即经咒，在布依族中有‘解帮经’‘祭祀经’等项目；也包括告诵，即主持仪式时的宣示和面向神灵的通告。根据《周礼》，国子们所学习的仪式‘乐语’，有兴（起兴）、道（道古）、讽（背文）、诵（吟诵）、言（宣告）、语（答述）等品种。而从满族的《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看，仪式朗诵用于还愿、背灯祭、跳神、祭祖宗、换锁、跳舞、送净纸等项目，是巫师最重要的技能。”<sup>[11]</sup>巫史之“志”正是“诗”要记录的重要内容，在文字未发明的时代，对集体知识和精英智慧的记录主要依靠口传，而口传言语的诵读特征会让这些知识和智慧更便于记忆和传播；在有文字的时代，“诗”的这一特点自然也被延续了下来。“诗”之言的诵读特点，或许正是“诗”从记“志”之“言”而转变为一种韵文文体的重要原因。

从上面分析可知，“诗”的最初含义是指记录“志”的一种文本形式，而“志”在早期的内涵至少包含了集体知识和精英智慧等内容，因此，“诗”所记录的内容自然也相当丰富。《诗大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sup>[18]</sup><sup>[343]</sup>正是遵循“诗”之本义来说的。

如果依据“诗”的最初含义再来看《尧典》中对“诗言志”的叙述，此处之“诗”与《诗大序》中之“诗”的意思

显然并不能划等号。《尧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sup>[18]4</sup>从“典乐”与“百兽率舞”来看，舜命夔教胄子的，显然是与仪式相关联的知识，而巫史之“志”正是那个时代知识的主体内容。这里“谈论的并不是文学问题，而是诗、歌、声、律之间的递进关系”，“显而易见，这是存在于仪式之中的事物关系”。<sup>[11]</sup>“诗”在这里更多指向的是记录一般知识的文本，而诗、歌、声、律则是与仪式相关的乐的组成部分，“诗”在此处并没有特定文体的意思，或者说是处于“记事”与“文体”逐渐过度的时期。不过，诗与歌、声、律的配合，使得诗这种记事文本区别于其他记事文本，逐渐具有了明显的韵文特点。

“诗”从记事文本向韵文文体发展演变，应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期韵文文体有着多种名称，如歌、谣、诵等等，而“占卜有繇词，亦是诗的性质。殷代《归藏》的繇辞已在湖北王家台的秦简中发现。繇是诗的一种，是占卜的副产品”<sup>[6]136</sup>。显然，类似后世“诗歌”这样一种文体在殷商前就已存在，但“诗”成为韵文文体的总称，则与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有关。

西周之初文化由巫史转向礼乐，“诗”作为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的功能也开始由“昭告神明”向“礼仪规范”的方向转变；而因为“礼乐”是西周时期最为重要的制度和知识，所以作为记录前人知识和智慧的“诗”也得以开始影响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配合礼乐需要而对诗文本进行编辑整理以备礼仪之用成为时代需求。正如有学者所言：“诗文本是为仪式的目的编辑而成的。”<sup>[19]10</sup>《管子·小匡》云：“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较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sup>[17]396</sup>昭王穆王时期这次典籍编纂活动便应包含了诗文本的编辑。另一方面，“献诗”和“采诗”制度的出现，也对诗文本的编辑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西周时期，“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sup>[20]</sup>，朱自清先生说“献诗”在于“陈志”，若将“志”以“怀抱”来解，所谓“献诗陈志”似乎有点说不太通。其实“献诗”就是“献知”和“献智”，只不过是“以‘诗’这种乐中韵文方式来表达罢了”。“采诗”其实是另一种“献诗”方式，《汉书》所谓“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采诗”之后是要“献之大师”的，经过加工后才“闻于天子”。采什么诗？怎么加工？这还是由公卿列士来决定，因此天子所闻，其实还是他们的“献诗”。由此看来，西周时期的“献诗”，和后世的“献策”更为相似。“献诗”和“采诗”无疑都要编辑诗文本，这种风气，对诗文本的归类编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至少在《诗经》成书之前，西周时期已有《雅》《颂》及各地之《风》这类诗文本类编的出现。<sup>[19]293</sup>各类诗文本类编的出现，会不断推动“诗”这种韵文文体的特征被认识，最迟到春秋中期“诗”成为《风》《雅》《颂》的总名时<sup>[19]391</sup>，“诗”的文体意义基本被确定下来。

这样看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所载的“诗以言志”，与《尧典》中舜所言“诗言志”，意思显然并不一样。尧舜时期的“诗”尚未形成诗歌文体的概念，那时的“诗”主要是指对集体知识和精英智慧的记录，所以“言志”指的是“言知”和“言智”。而在“赋诗言志”的春秋时期，那时的“诗”已有较为确定的文体特征，那时所言之“志”，已更多指向赋诗者的个人怀抱了。“这里的‘诗以言志’，已经不是告语的记忆或生活的记录，同时也不是礼乐典仪式，而是用来直接抒发赋诗者的怀抱和展示他们的风采了。”<sup>[12]</sup>

综上所述，现在可以回答本节标题的问题了，“诗”何以“言志”？“诗”最初就是用来记录“志”（群体知识、精英智慧等）的文本，因其多与乐、诵配合而呈现出韵文的特点，经过多年演变最终成为一种特定韵文文体的总称。但即使如此，作为一种文学文体的“诗”也并没有完全丢掉其“记录”知识与智慧的意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文学文体的“诗”的“言志”内涵，在先秦时期至少包含了“诗言知（集体知识）”“诗言智（精英智慧）”和“诗言志（个人怀抱）”等三个方面。

### 三、“言志”批评之意义

“诗”从最初记录“志”的文本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特定的韵文文体，其对“言志”的强调在不同时期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朱自清先生曾将“诗言志”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就朱先生的这一说法来看，显然不同阶段“言志”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献诗陈志显然是为了呈“智”，赋诗言志所言多为“个人怀抱（偏政教）”，教诗明志所明者乃前人之“知”，作诗言志所言则是“个人怀抱（偏情感）”。“言志”内涵的丰富性，以及“诗”文本的广泛影响，使得“诗”的“言志”批评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乃至文学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面两个方面尤为突出。

第一，诗歌批评的家国情怀。“诗”作为记录群体知识和精英智慧的文本，一开始本就与群体命运紧密联

系在一起。至西周因礼乐文化盛行而对“诗”进行编辑归类后,其与政治关系更为密切。诗文本编辑归类的  
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于仪式,服务于西周的礼乐制度,显然这与国家命脉息息相关,《颂》与《雅》多属此类。  
《左传》中所载一段便很好地展示了“诗”的政治功能:“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  
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  
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  
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sup>[21]</sup>另一方面诗文本的编辑归类是为了“献诗”,“献诗”同样是与  
国家政治紧密关联的一种活动,其目的在于有利“天子听政”,采自不同地域的诗,还编成不同地域的《风》。  
故《诗大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  
焉。”<sup>[18]343</sup>又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  
始,诗之至也。”<sup>[18]344</sup>如果从今天我们对诗歌体裁的认识来看《诗大序》的这种说法,会感觉令人难以理解  
“诗”如何可与“经国之大业”扯上关系,但从“诗”的最初的意义来看,就不难理解古人给“诗”赋予的这份厚重  
意义了。正是基于这种关系,中国古代诗论特别重视“诗”的“正得失”功能,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诗歌应该“神理共契,政序相参”<sup>[22]</sup>。古代诗论重诗歌与政治之关系,常为今人所垢病,但了解“言  
志”批评的源流后,应给予古人这种观念以理解之同情。

第二,诗教传统的建构。“诗”作为远古时期的知识系统,很早就成为教育中的重要资源。远在尧舜时期  
帝舜命夔“教胥子”,便包含了“诗”在内。至西周乃至春秋时期,“诗”也有着重要的教育功能。《周礼·春官  
·太师》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  
革、丝、木、匏、竹。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sup>[8]607-611</sup>《礼  
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  
《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sup>[9]404</sup>春秋后期孔子删诗以教弟子,  
使“诗”的教化功能更为凸显。《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  
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  
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sup>[23]</sup>朱自清  
先生说:“当时献诗和赋诗都已不行……一般只将诗用在言语上;孔门更将它用在修身和致知——教化——  
上。……用在修身上,也始于春秋时。”<sup>[2]22</sup>关于学诗的意义,孔子曾有一段著名说法:“诗可以兴,可以观,可  
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sup>[18]64</sup>识鸟兽草木之名可以说是得“知”,兴观群怨  
可以说是得“智”,事父事君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了。《荀子·儒效》亦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  
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  
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  
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sup>[18]177</sup>“诗”由先秦儒家  
不断强化的教化功能,最后在《诗大序》中得到完美确认:“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  
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  
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sup>[18]343-344</sup>自此之后,以诗教化便成为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重要传统。

当然,“言志”批评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远不止此,从其最初内涵的丰富性所引伸出来的广泛影  
响,非一篇文章能道尽,我们后续还将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 [参 考 文 献]

- [1] 闻一多. 歌与诗[M]//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第10册.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 朱自清. 诗言志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 臧克和,王平. 说文解字新订[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4] 陈伯海. 释“诗言志”——兼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J]. 文学遗产,2005(3):79-91.  
[5] 高华平. 诗言志续辨——结合新近出土楚简的探讨[J]. 文学评论,2008(1):106-112.

- [6] 饶宗颐. 诗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简资料为中心[M]//饶宗颐.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7] 饶宗颐. 贞之哲学[M]//饶宗颐.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8—99.
- [8] 李学勤. 周礼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9] 李学勤. 尚书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0]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9.
- [11] 王小盾. 论汉文化的“诗言志,歌永言”传统[J]. 文学评论,2009(2):19—26.
- [12] 王齐洲. “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J]. 清华大学学报,2010(1):38—51.
- [13]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381.
- [14] 王文锦. 礼记译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01:327.
- [15]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26.
- [16]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94—195.
- [17]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M]. 北京:中华局书,2004.
- [18] 张少康,卢永璘. 先秦两汉文论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19] 马银琴. 两周诗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20] 徐元诰. 国语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02:11.
- [21]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0:932.
- [22]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6:63.
- [2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936—1937.

(责任编辑:程晓芝)

##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f “Expressing Ambition” Criticism

GAO Wen-qi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t:** The origin of the “expressing ambition” criticism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time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the meaning of “zhi” and the meaning of the main text—“shi” that carries the function of “expressing ambition” have all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zhi” mainly refers to “knowledge” and “wisdom” and their records, while “shi” is the textual form of such recor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yanzhi”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expressing knowledge” and “expressing wisdom” to “expressing ambition (feelings)”, and “shi” has also evolved from a general recorded text to a specific verse genr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solidification of the Poetry compil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tradition of cultivating by Poetry, the first program of poetics—“poetry expresses ambition” (expressing one’s feelings in poetry)—was established, which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poetry; ambition; expressing ambition